

20世纪
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中国抗战文学新论

New Thought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房福贤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中国抗战文学新论



房福贤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抗战文学新论 / 房福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1341 - 7

I. ①中… II. ①房… III. ①抗战文艺研究—中国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968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门小薇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总 序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社会、思想史，一向比较重视那些突破性的阶段，所以上下两千年都得一一涉及，但重点还是观其变。比如上至春秋战国之际，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下到清末民初之际，都做比较深入的研究。而至于一个时代定型之后没有什么太大波动的，往往置之不论，所以在学术思想史方面，我并没有从事前人所谓‘述学’或‘学案’式的工作。”余英时对“变动”的兴趣给人以极大的启发，而20世纪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变动”特色的时代。在这一百年里，不仅发生了由大清到民国、由民国到共和国的转变，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与思想，也诞生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新文学。时间虽然短暂，但由于处于历史的剧烈变动期，却留给了中国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巨大的活动空间。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思潮、文学等等也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作为当代学人对这个时代文学思考的成果。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教师。海南师范大学成立于1949年，迄今已有60余年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它经历了由学院到师专，由师专到师院



再到师大的曲折过程。但无论什么时候，海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是学校的优势学科。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海南师范学院调整为海南师专，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全国学联主席、中国新诗的开拓者、时任华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的康白情，也被调到海南师专任中文系教授。虽然这是作为学者、诗人的康白情人生中与海南的一次短暂交集，且不乏贬谪的苦涩意味，但他的到来还是为当时海南这所惟一留存下来的高等学校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康白情在海南师专工作期间，虽然主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他作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新文学的直接参与者，却给当时中文系的师生们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师生们得知郭沫若是因为读了康白情的《草儿》等新诗，“委实吃了一惊，也唤起了我的胆量”才开始写作新诗之后，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感受更直接了。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一向有写诗的传统，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向有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情，与此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大批优秀人才怀着创业的激情从内地来到海南，特别是海南建省之时，更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本学科现在还在工作的几位骨干老师就是那时候从内地高校来到海南的。这些老师的到来不仅强化了当时尚在发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且，他们还以辛勤的努力和众多的学术成果让地处一隅的海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步入了国内学界的先进行列。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不仅被批准为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还被国务院学位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进行立项建设，海南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从此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学科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

本丛书的编写原则，以集中体现个人的研究方向、特色为主，不强求体

例上的一致性。总体上看，这套丛书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丛书的第一个特点。丛书的作者虽然都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普遍有着自己的专长与学术兴趣，有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着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因而使丛书具有较强的理论建设意义。积极的创新意识，是丛书的第二个特点。丛书的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作者多是近些年来新毕业的博士，思想束缚少，学术上有冲劲儿，虽然有许多论题并非人所未论，但由于观点新颖，故而研究也不乏新意与创意。当然，我们也知道，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局限，丛书的一些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学术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不管怎样，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对读者在学术上有所启迪，我们的目的与愿望则庶几达成矣。同时，借丛书出版的机会，我们更加期望得到学界同行和热心读者的指教。

本丛书既是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建设专项课题的成果，特记。

是为序。

房福贤

2012 年 5 月 1 日

于海口金花村

目 录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1
-------------------------	---

上编 20世纪中国抗战文学综论

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3
中日战争小说：世纪末的思考	16
“二战”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抗日战争文学	32
风雨六十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	46
民族文学视野中的山东抗日文学	57

中编 战时中国抗战文学论

战时中国抗日小说简论	71
“七月派”国军抗战小说简论	81
战时“大后方”乡土抗战小说简论	91
茅盾的抗战小说	104
《火》：巴金的最后一部“三部曲”	113
老舍：从《火葬》到《四世同堂》	122
姚雪垠对抗战文学的贡献	130
抗战文学的精神价值	139



下编 新时期中国抗战文学论

论新时期抗战史小说的史诗表现形式.....	151
论新时期传统抗战小说的艺术更新.....	161
论新时期抗战小说的命运主题.....	171
论新时期抗战小说的爱国主义审美变奏	182
论新时期抗战小说的审美表现艺术.....	193
论新时期抗战小说的本体美学意识及其表现	198
新国军抗战小说简论	206
《长城万里图》与抗战小说的历史突破	217

上 编

20世纪中国抗战文学综论



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200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60 年一个甲子，按照中国的习俗，一个甲子结束，其中荦荦大端者理应清点检视一番，以便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智慧和勇气，重新领受天意，在又一个历史关头看清我们的来路与去向。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本书拟就抗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抗日文学的评价问题

抗日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不仅是指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文学（抗日文学与抗战文学在概念上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一般而言，抗战文学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是对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一个总称，它包括抗日文学而不仅指抗日文学）。

如何认识和评价战时和战后的抗日文学，一直有着理解上的误区。从战时到战后的 40 年间，文学的功能性因素被强调，其评价标准基本集中于政治意义的层面上，因而其文学史地位较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本体意识的被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成为主要的文学评价的基础，抗日文学则受到了较多的批评，认为其文学含量不高，文学史的价值不太。这种极端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实行了一种绝对价值标准的原因：要么是政治的标准第一，要么是艺术的标准第一。而使用标准的一元化，则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战争文学由于生成机制不同，一般都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



战争作为现实内容的战时形态和战争作为历史记忆的战后形态。笔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产生于不同时代中的不同抗日文学，应当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战时的文学应以文学之外的政治标准为基本的评价准则，战后的文学则以文学本身的审美标准为基本的评价准则。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悖论。

为什么要用非文学化的标准评价战时抗日文学？理由很简单：战时的文学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文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一种群体的生存斗争。作为适应着战时的国家、民族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特定时空内有着特定内涵的艺术，审美创造不是文学的主要目的，参与到国家民族的伟大抗日事业中去，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战争作为生存现实的前提下，作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遵守战时道德，走向战争，将文学融入战争机制，成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既是时代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特殊要求，也是所有正义战争中文学家和文学必须坚守的一种基本道德准则。因为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文学家和文学要想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都是不可想象的。当代作家邓一光在被记者问到“你不幸生在战争年代，你会干嘛？”时，邓一光这样回答：“我会先考虑战争的性质，但我想一切思考都无法让我逃出狭隘的圈子，如果是一场民族战争，像抗日战争那样，我肯定会报名上前线。我不会让别人杀掉我的孩子。”^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法国和美国文学界的表现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估计有 1000 多名作家披上了戎装，其中光荣牺牲的有 417 人”。^②其间的文学创作几乎全部集中于卫国战争。在法国，“平时各不相容的作家，居然能在反侵略的旗帜之下，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

① 万静波：《战争文学底线：悲悯和人性关——作家邓一光访谈》，《南方周末》2002 年 3 月 7 日。

② 金重远：《炮火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0 页。



无论是极右的天主教作家，或极左的共产党作家，紧紧团结在‘打倒法西斯，援救法国文化’的口号之下”。而“在战前，法国的文学与政治不发生直接关系。沦陷期的文学却给了此次法国反败为胜的努力以莫大的支助”。^① 远离战火的美国文学界，也没有远离战争。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这是世界进步力量与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较量。这次战争对美国进步人士（包括文艺界）的震动是巨大的。美国作家联盟（相当于我国的“左联”）相应调整了行动方向，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把矛头对准国际上的法西斯主义。1936年至1941年，作家联盟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相继召开了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以海明威为首的作家代表团访问西班牙，并为林肯支队选派志愿军战士做出努力。^②

海明威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造就的“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这时不仅出入于前线，还创作出了《战地钟声》这部新英雄主义小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战争结束未能赶上驾机赴欧作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又过了服役年龄的著名作家福克纳，这时也从自己以往的文学世界中走出来，用笔为战争效力。他除在好莱坞编写了几部有关战争的电影脚本如《戴高乐的故事》、《北方的追逐》等外，还写了几篇与“二战”有关的《约克纳帕塔法》短篇小说，亦即他那个南方世界里的乡下小伙子在“新形势”下可能做出何种表示的故事。斯坦贝克也在1942年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月亮下去了》，由于作者在此书中描写了挪威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于1946年

① 《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

② 李文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书系·美国编·序》，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被挪威国王哈肯颁赠“自由十字勋章”。而作家艾伯特·马尔兹194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十字奖章与箭矢》，曾由美国政府印刷十万余册，分发给欧亚战场上的美国军人，用以激励士气。

反面的例子是，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全国实施“文坛总动员”，绝大多数日本作家都积极地投身于侵华战争。有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有人直接应征入伍成为军中的一员，更多的人则加入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组织。当时，形成了以火野葦平、栋田博、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作家为代表的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炮制作品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火野葦平以《粪尿谈》获得1937年下半年“芥川奖”时，还是一名在中国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他因此被军部调到报道班，身兼士兵与作家身份的他，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之战；创作了《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当时发行上百万册。火野葦平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日本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而同样获得“芥川奖”的石川达三因为《活着的士兵》写了日军士兵“杀戮非战斗人员、掠夺、军纪涣散的反军内容，扰乱社会秩序”而禁止发行并以“捏造事实，扰乱治安”、“违反报纸法”的罪名被起诉，法院判其监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①这都说明，战争时期，文学的战争化不仅必要而且是必然的。

文学的战争化，从文学的角度讲，的确是文学本身的某种程度的异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文学的必要的牺牲。说到底，文学毕竟是整

① 余戈：《“笔部队”炮制作品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文汇报》2005年6月8日。



个人类文化创造的一个小小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中的一个小小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赖以存在的整体出现了危机，那么这个部分将如何生存？很难想象，在一个民族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时，作家还可以不闻不问窗外事，一心一意创作所谓不朽的留之后代的伟大作品。如果一个民族的作家都修炼到如此境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没落的、衰亡的民族。沈从文曾在战争中提倡“文学运动的重造”，要作家创作“使异世读者还可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的工作，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①，却毫无应者，而他本人在抗战后几乎成了一个找不到位置的“多余人”，就说明了问题。同样，在今天我们以看似客观、公正的态度，手持所谓的文学标准，高高在上地批评我们的前辈作家没有写出优秀的经典作品，甚至认为这种牺牲“不是高尚的行为，因为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②这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悲哀。

反过来，这种非文学化的评价原则，对于战后的抗日文学就不适用了，评价战后的抗日文学我们必须采用严格的文学标准，这是因为战后与战时的文学创作环境和目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当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危机已经过去，现实的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记忆时，抗日文学作为战争机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价值意义也就大大的淡化了。从战后抗日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价值意义来说，它不再是现实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是对过去的历史和人生的一种反思与重构，是一种艺术的独特发现与再创造。因为它所面对的读者对象已不再是挣扎于战争漩涡中的人们，而是和平时代的文学消费者。在这样的时代，所有的文学题材都不再具有

① 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10月。

② 李新宇：《硝烟中的迷失——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



决定性的、特殊的审美价值与意义。人们并不因为某部文学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而特别青睐于它，如果人们对它有兴趣，那首先是因为它是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所以，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化的要求，注定成为抗日文学的首要选择，很自然地，这也必将是我们评价和平年代抗日文学价值的首要标准。

这种双重标准极易受到质疑：既然抗日文学也是文学，那么就应该一视同仁，都应当强调文学性，而不管它是战时还是战后。在传统的、经典化的文学研究观念体系里，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放置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的“文化研究”视野里，这种评价准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文学的本真历史并不是由文学研究者所遴选的少数经典构成，鲜活的文学史其实也就是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①，要对人类文学史进行全面的审视，要对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学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进行全面评估，仅靠对文学经典的挖掘是远远不够的。在那些被排斥在经典大门之外的文学作品里，也许在文学价值的某些方面逊色于经典作品，但它们之所以诞生、流传，至少也包含了作家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凝聚了作者的艺术才华，其中更可能还具有许多经典作品所缺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况且，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本身就具有人为性的偏颇和话语权力的作用。因此，即使是从具体的评论、研究活动来说，这种二元化的方法也是可行的、有意义的。

也许我们只有分别从文化的视野和文学的视野去理解我们不同时代出现的不同的抗日文学，才能说明中国抗日文学滞后与发展的原因，也才能摆脱抽象肯定与具体否定，或者反之亦然的尴尬。

（二）抗日文学的民族主义问题

战争文学，尤其是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文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

^① 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爱国主义作为伦理学上的一个范畴，是指个人对于自己祖国或民族抱有的一种朴素、深厚的感情。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最基本的凝聚力。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这种精神的凝聚力却能在世界上独立尊严地长久生存下去。正因为爱国主义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有着如此强大的凝聚作用，古今中外伟大的文学家们，无不在自己的创作中高扬这种精神。尽管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但人们却不会因此而否定他们是伟大的作家。尤其是正处于一个由弱而强的发展途程中的国家和民族，更需要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大力提倡和表现爱国主义，以凝聚全民族的意志，激发全民族的潜能，创造全民族的宏业。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一切民族文学永恒的母题。爱国主义作为一个表现主题，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题材领域，但是，在反映民族反侵略战争的文学中，这一主题表现得最为充分，正是从这一点上，它显示出了战争文学特有的个性，好的战争文学必须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国的抗日文学，自发生之日起，就始终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在战时成为有力的武器，而在战后又成为一代人生活的教科书。20世纪90年代初，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作品中，有不少就是不同时期出现的抗日文学作品。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却有着众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以反侵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几乎就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说法。没有人否认抗日文学应当表现我们的民族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作家们对于民族主义精神却不大能够理直气壮地予以张扬。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主要是受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唯恐民族主义的张扬影响了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的对立格局，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全球化时代世界一体性